

巾箱本的雅與俗

■ 井上 進

巾箱本即小型本，本來是爲了常把經史典籍放在自己身邊而產生的，到了後世，也有一些藏書家欣賞其小，往往譽其爲「殊便展玩」，「古雅可愛玩」。但在進入印本時代以後的現實世界裡，巾箱本的絕大部分是不齒於大雅的坊刻俗書，如以「懷挾」（作弊）爲目的的舉業書等。但也正是這些俗書，至少從現代的觀點來看，才有著自身獨特的資料價值。因爲它們是應與文雅世界相隔遙遠的下層士人的需求而出現的，在它們的身上或多或少反映了非精英社會的現實。

巾箱本又稱袖珍本，對於大多數人而言，其名應該並不陌生，但其典故由來，卻未必所有人都清楚。因此先引葉德輝（1864-1927）《書林清話》卷二所作的說明，來做拙文的開端吧。之所以特意引用葉著，是因為其記述了以往目錄版本學不大關注的諸多刻書掌故，遂爲「別自開一蹊徑」（他的侄子葉啟崑跋言）的名著，對巾箱本也大約首次進行了頗爲詳細的闡述：

巾箱本之名，不始於有刻本時也。晉葛洪……云：「劉子駿（歆）《漢書》一百卷，……今鈔出爲二卷，以裨（班固撰）《漢書》之闕。爾後洪家遭火，書籍都盡，此二卷在巾箱中，嘗以自隨，故得猶在」（《西京雜記》卷六）。《南史》（卷四十一）「齊衡陽王鈞，手自細書《五經》，部爲一卷，置於巾箱中，以備遺忘。諸王聞而爭效爲巾箱《五經》」。此蓋小裘（帙），便於隨行之本。南宋書坊始以刻本之小者

爲巾箱本。宋戴埴《鼠璞》下云：「……今巾箱刊本無所不備。嘉定間，從學官楊璘之奏，禁燬小板，近又盛行。第挾書，非備巾箱之藏也。」觀此則宋刻巾箱全爲士子懷挾之用，誣此美名矣。

近世所傳各經，宋版最小者有不分卷《九經》，見《天祿琳琅後編》三。一爲《婺州本點校重言重意互註尚書》，卷止四寸，寬不及三寸，見《瞿目》（瞿鏞〔1794-1846〕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卷二）。一爲……。

何謂巾箱本？是可以「置於巾箱中」的「便於隨行之本」，即謂小開本的書，而其尺寸並沒有一定的規格，是一種相當主觀的概念。袖珍本這個稱呼也一樣，只不過指能夠夠放在袖裡、便於攜帶的書罷了。但即便是主觀的概念，它必須是便於攜帶的小型本，而其便於攜帶，是從好學的要求而來的，爲的是能夠常將其放在身邊，隨時溫習。此外，

《書林清話》中雖未提及，但它出現的原因也許還應該包括尺寸小而使其變得小巧玲瓏，惹人喜愛。一千年前日本女流隨筆家清少納言（966-1025）曾說：「所有纖小的東西，都很可愛」，這種感覺應該不是只有日本人才有的。

巾箱本最初本是文人雅士的高雅之物，但進入印本時代以後的現實世界裡，其小巧易攜帶的特性，被認為正適合「為士子懷挾之用」，竟然成為偷偷地帶入考場作弊的工具。並且，其小型的屬性就意味著用紙量較少，因而出版經費也能降低，更為書肆所樂見。十一世紀中期的「嘉祐、治平間，鬻書者為監本字大難售，巾箱又字小，有不便，遂別刻一本，不大不小，謂之《中書五經》，

讀者就買」（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卷二百六十六，熙寧八年〔1075〕七月辛巳條引呂陶《記聞》）。這個故事就說明，相比於不得不高價的大字本，在價格競爭力方面，巾箱本更具有優勢。

總之，在印本時代的現實中，大部分的巾箱本是低品質、低價格的坊刻本，並且其中相當一部分本來就是作為考場作弊的工具而被出版的，可謂體現了與高雅完全對立的庸俗至極。

此外，葉德輝說「巾箱本」始於「南宋書坊」，這是錯誤的。此點一看上引的北宋人呂陶（1028-1104）的證言即可明晰，還有南宋人張淳也在其《儀禮識誤》自序中提到：「此書（《儀禮》）初刊於周廣順之三年（953），復校於顯德之六年（959），本朝因之，所謂



圖1 《九經》 明覆宋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監本者也。而後在京則有中箱本，在杭州有細字本。渡江以來，嚴（浙江嚴州）人取巾箱本刻之」。葉著確實是「別開蹊徑」的書，用現代的話來說，是「開創性的著作」，因此要充分肯定其筆路藍縷之功，但同時也需要指出其在各個部分的準確度往往是很可疑的。

比如葉氏所舉的巾箱本的實例，其依據基本上是目錄的記載，而非親眼所見，因此其所講述不能說一一都正確。天祿琳琅本《九經》幸而一直保留在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稱「故宮」），但它並不是宋版，而是明覆宋版。（圖1）再說《婺州本點校重言重意互註尚書》，也是近年通過奇緣歸故宮庋藏的，¹其「州」

為衍字，又所謂「卷（當即「高」或「長」之意）止四寸，寬不及三寸」，是依據《鐵琴》目所載，而用工部尺（一寸3.2公分）來計算，與實物不符。因為此書的版框為長10.2，寬6.7公分，開本也高14公分有餘。（圖2）

瞿氏所說的「卷止四寸，寬不及三寸」，恐怕是沿襲之前收藏此書的陳鱣（1753-1817）之言。因為陳氏曾說：

《尚書》孔傳十二卷，宋刻巾箱本，題曰《婺本點校重言重意互註尚書》。……按王德甫（昶）司寇《春融堂集》（卷四十三）有〈宋刻周禮跋〉云：「宋版小本有重言重意者」，又〈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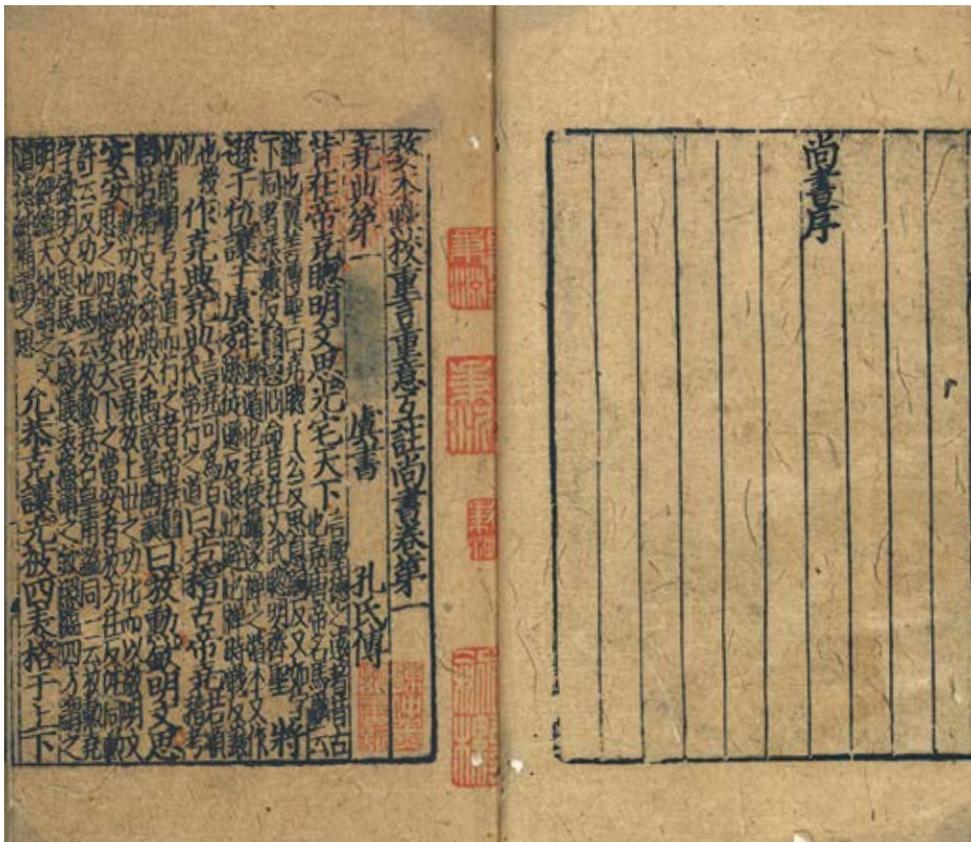


圖2 漢 孔安國傳 唐 陸德明釋文 《婺本點校重言重意互註尚書》 宋刊巾箱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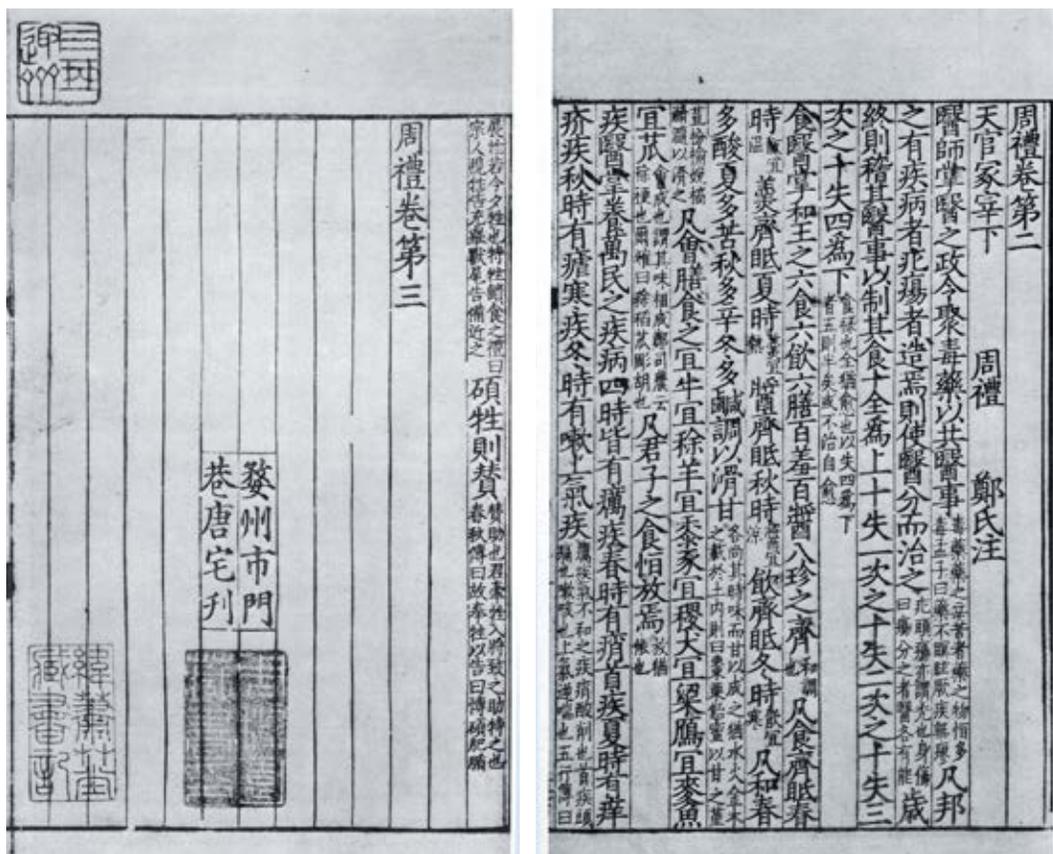


圖3 東漢 鄭玄 《周禮注》 宋婺州刊本 引自北京圖書館編，《中國版刻圖錄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60），圖版88-89。

本春秋左傳跋》云：「長四寸餘，寬不及三寸，題云婺本附音重言重意春秋經傳」，俱與是本體格相同。蓋宋時婺本羣經竝刻，《九經三傳沿革例》云婺州舊本，即婺所從出也。……余得之吳閩書肆，首尾完善，彫鏤精良，小可納懷，殊便展玩。（《經籍跋文》宋本尚書孔傳跋）

但王昶說「長四寸餘，寬不及三寸」，指的是他自己所藏的《左傳》，而此帙又不是《婺本附音重言重意春秋經傳》。看王跋的原文可知，他所藏的是宋版《春秋經傳集

解》，而其「婺本」之名，不過是見於據別本鈔配的部分。又如陳氏將此書定為「婺本羣經」之一，而瞿氏也承襲這種看法說：「其題婺本者，宋時刻書多舉其地首一字，如建本、杭本、明本之類」，是決不能令人首肯的。

看到書影就可以一目了然，此「婺本」的版式字樣完全是建本的，與真的婺本，如浙江金華的「婺州市門巷唐宅刊」本《周禮注》（圖3），一點都不像。²筆者曾經指出院藏日本·朝鮮覆元末明初「古杭勤德書堂刊」本原本，絕不會是杭州刊本而是建陽刊本，³這裡的「婺本」也是如此，只不過是建陽書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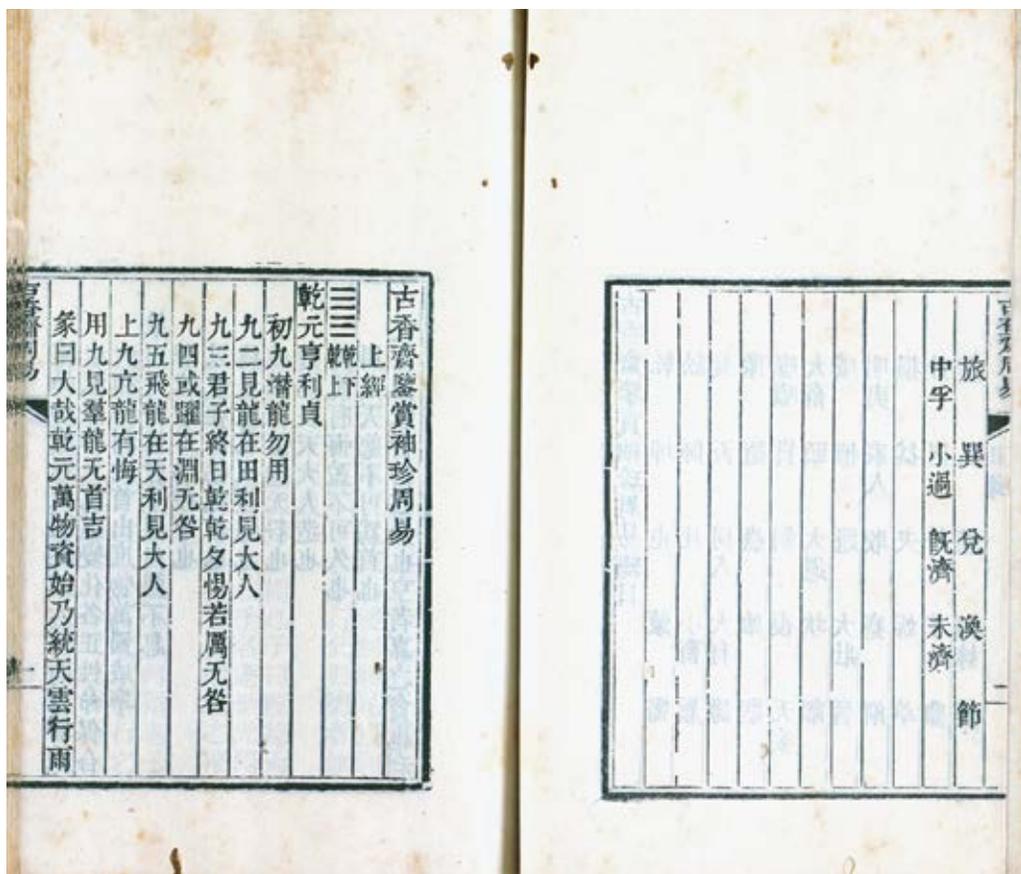


圖4 | 《五經》 清乾隆十一年（1746）武英殿刊古香齋袖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的故意作假，或是不實的廣告而已。

建陽坊刻的巾箱本《尚書》，本來是毫無疑問的俗本，但經過數百年，它逐漸被看作是古香可掬的吉光片羽了。於是陳鱣稱其「雕鏤精良，小可納懷，殊便展玩」，王昶也稱其所藏的宋刻巾箱本《左傳》為「古雅可愛玩」。曾經的俗，如今不僅不俗，而且成為了真正的雅，變身為讓文人學士賞玩不已的善本。

除近年透過捐贈等途徑入藏的若干部以外，院藏的巾箱本幾乎全部都是自宋元至明代前期刊行的「古雅」善本，即便是比較新

的刊本也是「雕鏤精良，小可納懷」的精本，比如奉乾隆帝之命，「爰仿古人巾箱之式」刊行（《國朝宮史》卷三十五）的《古香齋鑒賞袖珍》諸書。（圖4）這也是理所當然的，因為今日的故宮藏書是以曾經的宮中藏書為核心，加上楊守敬（1839-1915）的觀海堂藏書和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善本而成立的。如此正統、爾雅的藏書裡，豈能見到像明末以後的坊肆專門為了「懷挾」之用而出版的、地地道道的俗書呢？

但若要討論本來就應不登大雅之堂的需求而產生的「巾箱刊本」，只談善本、精本，

人物。

似乎是處於士商之間的李氏說，這本書對「詞人墨客」非常方便。即便是老成者，要押韻時「未免間有訛遺」，然而如「獲此寸珍，以出入懷襲」，那就沒有什麼問題了。但連作詩上的基本要求押韻都沒有把握好，必須要偷偷看一下懷中參考書的話，這些「詞人墨客」的知識、學問水準是夠淺薄的。也就是說，李氏所謂的「詞人墨客」，絕對不是真正的讀書人。

明末的文人兼大官何喬遠（1558-1632）為「旅舍船步，時時賦詩為娛樂」的杭州商人黃徽寫了一篇〈詩賈傳〉稱：「夫有唐也，以詩名其代也。桑門閨秀，皆進乎技，賈人缺矣。季美（黃氏）詩……見吾世之盛也」（《鏡山全集》卷五十八）。還有清初學者朱彝尊（1629-1709），他引用何氏之言的同時，自己也如此說道：「明以賈客而稱詩者眾矣」（《靜居詩話》卷二十四〈雜流〉）。無論是何喬遠，

還是朱彝尊，他們都認為商賈也能加入詩人的行列，且將其作品流傳於世，是只有在明代——其實更準確地說是在明末，才會發生的特殊現象。

像何喬遠、朱彝尊這樣的堂堂學者特意表彰的人，恐怕不會是記不住韻字的。但在這些「詩賈」的背後，應該有一大批假冒的「詞人墨客」，欠缺進入古典詩世界所必要的讀書與修煉，卻裝詩人相而沾沾自喜，因而促進文化的俗化。《韻要》這本書就是以這樣的人作為顧客來刊行的，無論其內容，還是其形式，都或多或少反映了明末「俗」勢力的增強。

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崇禎刊本《武經大全》，開本為長 12.8，寬 8.4 公分，版框長 10.2，寬 6.9 公分，共十三冊。此帙其實為一種叢書，子目共計十六種，除了冠以崇禎九年（1636）何言序的何氏訂本《孫武子十三篇》等七種（即《武經七書》）外，還收錄



圖6 明 佚名輯 《武經大全》 崇禎刊本 個人藏

了《新擬武闈論集》、《新訂武闈策學考實》，以及帶圖的《軍器圖說》和《穿揚（楊）捷指》（「穿揚」即射技之意）等等，確實是應對武舉的「大全」。（圖6）

這套「大全」當然是舉業書，恐怕也是供「懷挾」之用，但與常例不同的是，它是為了應對武舉的書。明朝任用武官的「祖制」是世襲，但大約自天順·成化以後，也漸漸嘗試武舉，到了弘治以後，基本上都按期舉行，成為了與世襲制並行的出身（任官）之途。儘管如此，武舉作為達到社會層面上的成功、亦即做官發跡的路徑，到底具有多大意義，是頗為可疑的。

然而到了崇禎年間（1628-1644），武學、武舉遽然被重視，朝廷要把武舉的規格提高到與文舉同等，重新設置了武殿試。之所以導致這種情況，不僅僅是因為當時的危殆情勢，還有更深層次的內在原因，但無論如何，武舉所具有的意義比以前變大了許多。⁴於是善於見機行事的書商們就致力出版各種各樣應對武舉的舉業書，因而出現如此一帙，全面應對武舉的「大全」，並且既是巾箱，又是部分帶圖。

進入清代，科場的混亂與不正之風被嚴格取締，而俗書的出版整體上也有所衰弱，像可以供「懷挾之用」的巾箱舉業書的出版，雖然並沒有絕跡，如下文有所談及，但還是變得很不起眼。然而「道咸以前，科場搜檢之法至嚴」的狀態，「同治以後，禁網漸寬，搜檢者不復深究」（震鈞〔1857-1920〕，《天咫偶聞》卷三），遂至「士子之懷挾，直可設一絕大書肆矣」（梁溪坐觀老人，《清代野記》卷下）。

就這樣開始被大量出版的巾箱本舉業書

當中，現在介紹一下稍有特色的兩件。首先是《聖諭廣訓》，約清末刊本，開本為長13.2，寬8.7公分，版框長9，寬6.8公分，一冊。（圖7）之所以將此冊看作舉業書，是因為雍正三年（1725）之後，童試及生員的歲、科兩試上，考生必須要默寫《廣訓》（嘉慶《欽定學政全書》卷五十三〈童試事例〉）。如此大小，總共三十二頁的薄冊，的確可以供「懷挾」之用吧。

另外一件是《增廣試律大觀》三十二卷，開本為長11.3，寬7.3公分，版框長8.5，寬5.6公分，共四冊。（圖8）據卷端倪維高序，此書初刊於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，然後還出現了不少翻版與增補版。在這些版本中，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本似乎是道光原刊本，而據該館目錄，其長為14公分，再說大阪大學藏有成豐元年（1851）刊本，據網路目錄，其開本為長13.9，寬9.2公分。由此可以推測，此



圖7 清 世宗 《聖諭廣訓》 約清季刊本 個人藏



圖8 清 佚名 《增廣試律大觀》 日本樂善堂銅版印本 個人藏

書從頭到尾一直是作為巾箱本出版的。

現在提到的這一本，因為冠以倪序，應該是以光緒九年（1883）鉛字排印本為底本，封面記有「縮刻試律大觀」，裡面有「東都樂善堂／銅刻藏版記」的牌記。據此可知，這是日本人岸田吟香（1833-1905）在東京出版的。但專門為應科舉考試中的試律（試帖詩）而編纂的參考書，為什麼由日本人出版呢？難道還有日本人特意買這種書嗎？

其實，此書絕不是針對日本顧客而出版的。樂善堂除了東京總店之外，在上海也有分店，並透過這家分店向中國人銷售了許多日本書。特別是樂善堂印行的銅版本以精善著稱，大約光緒十年（1884）左右，有人稱讚「日本岸（田）君吟香……制為銅版袖珍書，細若牛毛，明于犀角，盈尺之書，可縮成方寸一二本」（黃式權，《淞南夢影錄》卷四）。

的確，像此《大觀》文字之小，是用木刻或石印無法實現的，岸田氏利用了當時中國沒有的新技術，特意向中國顧客出版了小字本舉業書，獲取了很大的收益。

巾箱本中固然有「古雅可愛玩」的精刻本，但其主流還是舉業書等低俗的短書。既然是低俗的短書，自然為傳統、正統的藏書家所不屑一顧，隨著時間流逝逐漸散失。但正因為這些俗書是應對非精英人士生活的需求而出現的，因此透過它往往可以一窺下層士人社會的一端，即從那些文人學士堂堂著作無法知曉的現實。從這樣的觀點來講，作為一部著作，即使是不值得一提的俗書，它的存在仍具有不可忽視的資料價值。

作者為日本名古屋大學教授

註釋

1. 有關此書的入藏經過，參照林柏亭主編，《大觀——宋版圖書特展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6），頁188。
2. 關於《周禮注》等宋代婺州刊本的版刻特徵，參照北京圖書館編，《中國版刻圖錄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60）。
3. 參見拙文〈觀海堂藏書點滴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76期（2014.7），頁28-35。
4. 參照井上進、酒井惠子譯注，《明史選舉志·1》（東京：平凡社，2013），〈武學〉，註8，頁234-237。